

文化
中国与世界
DIALOGU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新论

甘阳
主编

陈来 著

东亚儒学 九论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甘 阳 主 编

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

*

东亚儒学九论

陈 来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0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字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亚儒学九论 / 陈来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8

(“文化: 中国与世界”新论)

ISBN 978-7-108-02969-0

I. 东… II. 陈… III. 儒家—东亚—文集
IV. B222.05-53 B3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63655 号

责任编辑 舒 炜

装帧设计 宁成春 崔建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0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7.75

字 数 122 千字

印 数 0,001 — 7,000 册

定 价 19.80 元

“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

缘 起

百年前，梁启超曾提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以及“世界之中国”的说法。进入 21 世纪以来，关于“世界之中国”或“亚洲之中国”的各种说法益发频频可闻。

但所谓“中国”，并不仅仅只是联合国上百个国家中之一“国”，而首先是一大文明母体。韦伯当年从文明母体着眼把全球分为五大历史文明（儒家文明，佛教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的理论，引发日后种种“轴心文明”讨论，至今意义重大。事实上，晚清以来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从未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简单看成是中国与其他各“国”之间的关系，而总是首先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看成是中国文明与其他

文明特别是强势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二十年前，我们这一代人创办“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时，秉承的也是这种从大文明格局看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视野。

这套新编“文化：中国与世界”论丛，仍然承继这种从文明格局看中国与世界的视野。我们以为，这种文明论的立场今天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更加迫切了，因为全球化绝不意味着将消解所有历史文明之间的差异，绝不意味着走向无分殊的全球一体化文明，恰恰相反，全球化的过程实际更加突出了不同人民的“文明属性”。正是在全球化加速的时候，有关文明、文化、民族、族群等的讨论日益成为全球各地最突出的共同话题，既有所谓“文明冲突论”的出场，更有种种“文明对话论”的主张。而晚近以来“软实力”概念的普遍流行，更使世界各国都已日益明确地把文明潜力和文化创造力置于发展战略的核心。说到底，真正的大国崛起，必然是一个文化大国的崛起；只有具备深厚文明潜力的国家才有作为大国崛起的资格和条件。

哈佛大学的张光直教授曾经预言：人文社会科学的21世纪应该是中国的世纪。今日中国学术文化之现状无疑仍离这个期盼甚远，但我们不必妄自菲薄，而应看到这个预言的理据所在。这个理据就是张光直所说中国文

明积累了一笔最庞大的文化本钱，如他引用 Arthur Wright 的话所言：“全球上没有任何民族有像中华民族那样庞大的对他们过去历史的记录。二千五百年的正史里所记录下来的个别事件的总额是无法计算的。要将二十五史翻成英文，需要四千五百万个单词，而这还只代表那整个记录中的一小部分。”按张光直的看法，这笔庞大的文化资本，尚未被现代中国人好好利用过，因为近百年来的中国人基本是用西方一时一地的理论和观点去看世界，甚至想当然地以为西方的理论观点都具有普遍性。但是，一旦“我们跳出一切成见的圈子”，倒转过来以中国文明的历史视野去看世界，那么中国文明积累的这笔庞大文化资本就会发挥出其巨大潜力。

诚如张光直先生所言，要把中国文明的这种潜力发挥出来，我们需要同时做三件事，一是深入研究中国文明，二是尽量了解学习世界史，三是深入了解各种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有了这三个条件我们才能知所辨别。做这些工作都需要长时间、深功夫，需要每人从具体问题着手，同时又要求打破专业的壁垒而形成张光直提倡的“不是专业而是通业”的研究格局。这套丛书即希望能朝这种“通业研究”的方向作些努力。我们希望这里的每种书能以较小的篇幅来展开一些有意义的新观

念、新思想、新问题，同时丛书作为整体则能打破学科专业的篱笆，沟通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着重在问题意识上共同体现“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认识西方，重新认识古典，重新认识现代”的努力。

之所以要强调“重新认识”，是因为我们以往形成的对西方的看法，以及根据这种对西方的看法而又反过来形成的对中国的看法，有许多都有必要加以重新检讨，其中有些观念早已根深蒂固而且流传极广，但事实上却未必正确甚至根本错误。这方面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例如，就美术而言，上世纪初康有为、陈独秀提倡的“美术革命”曾对 20 世纪的中国美术发生很大的影响，但他们把西方美术归结为“写实主义”，并据此认为中国传统美术因为不能“写实”已经死亡，而中国现代美术的方向就是要学西方美术的“写实主义”，所有这些都一方面是对西方美术的误解，另一方面则是对中国现代美术的误导。在文学方面，胡适力图引进西方科学实证方法强调对文本的考证诚然有其贡献，但却也常常把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引入死胡同中，尤其胡适顽固反对以中国传统儒道佛的观点来解读中国古典文学的立场更是大错。例如他说“《西游记》被三四百年来的无

数道士和尚秀才弄坏了”，认为儒道佛的“这些解说都是《西游记》的大敌”，但正如《西游记》英译者余国藩教授所指出，胡适排斥儒道佛现在恰恰成了反讽，因为欧美日本中国现在对《西游记》的所有研究成果可以概观地视为对胡适观点的驳斥，事实上，“和尚，道士和秀才对《西游记》的了解，也许比胡适之博士更透彻，更深刻！”

同样，我们对西方的了解认识仍然远远不够。这里一个重要问题是西方人对自己的看法本身就在不断变化和调整中。例如，美国人曾一度认为美国只有自由主义而没有保守主义，但这种看法早已被证明乃根本错误，因为近几十年来美国的最大变化恰恰是保守主义压倒自由主义成了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种具有广泛民众基础而且有强烈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倾向的美国保守主义，几乎超出所有主流西方知识界的预料，从而实际使许多西方理论在西方本身就已黯然失色。例如西方社会科学的基本预设之一是所谓“现代化必然世俗化”，但这个看法现在已经难以成立，因为正如西方学界普遍承认，无论“世俗化”的定义如何修正，都难以解释美国今天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自称相信宗教奇迹、相信上帝的最后审判这种典型宗教社会的现象。晚近三十年来是

西方思想变动最大的时期，其变动的激烈程度只有西方 17 世纪现代思想转型期可以相比。这种变动导致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在被重新讨论，所有的基本概念都在重新修正，例如什么是哲学，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今天都已不再有自明的答案。但另一方面，与保守主义的崛起有关，西方特别美国现在日益呈现知识精英与社会大众背道而驰的突出现象：知识精英的理论越来越前卫，但普通民众的心态却越来越保守，这种基本矛盾已经成为西方主流知识界的巨大焦虑。如何看待西方社会和思想的这种深刻变化，乃是中国学界面临的重大课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今天我们已经必须从根本上拒斥简单的“拿来主义”，因为这样的“拿来主义”只能是文化不成熟、文明不独立的表现。中国思想学术文化成熟的标志在于中国文明主体性之独立立场的日渐成熟，这种立场将促使中国学人以自己的头脑去研究、分析、判断西方的各种理论，拒绝人云亦云，拒绝跟风赶时髦。

黑格尔曾说，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近百年来我们过于迫切地想把自己纳入这样那样的普遍性模式，实际忽视了中国文明的独特性。同时，我们以过于急功近利的实用心态去了解学习西方文明，也往往妨碍了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西方文明内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21 世纪

的中国人应该已经有条件以更为从容不迫的心态、更为雍容大气的胸襟去重新认识中国与世界。

承三联书店雅意，这套新编论丛仍沿用“文化：中国与世界”之名，以示二十年来学术文化努力的延续性。我们相信，“文化”这个概念正在重新成为中国人的基本关切。

甘 阳

2007 年中秋于杭州

前 言

在出版了几部有关朱子学与阳明学的著作之后，1992年我出版了《宋明理学》，此书以二十几位理学思想家为主，叙述了宋明理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以求展示出宋明理学的基本人物、学术派别、概念命题和理论特色，着力揭示宋明理学发展的固有脉络和内在讨论。在该书的结尾我写道：“事实上，把文化的视野进一步扩大来看，则理学不仅是11世纪以后主导中国的思想体系，而且是前近代东亚各国占主导地位或有重要影响的思想体系。因而，说宋明理学是近世东亚文明的共同体现，是不算夸张的。从而，要展现理学体系所有的逻辑环节的展开、所有实现了的可能性，就需要把整个东亚地区的理学综合地加以考察。遗憾的是，限于篇幅和学识，本书还不能完成这一任务，只在明代理学中

设了李退溪一节，对读者了解朝鲜朝的朱子学发展可能略有帮助。真正站在东亚文明的角度了解理学，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我在当时写下这些话时，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不妥之处，似乎以为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不妥之处，就是中国学者往往不自觉地把“宋明理学”等同于“新儒学”（Neo-Confucianism）。这种意识在中国研究的范围内并无疑问，但超出中国研究的范围就会发生明显的问题。如果我的书名为《新儒学》或《朱子学与阳明学》，我自然可以在其中叙述韩国和日本的朱子学及阳明学。但是“宋明”不仅是某种时间的标尺，而且是中国历史的朝代。在这个意义上，把李退溪列在宋明理学中叙述是不合理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新儒学”的概念是有其优越性的，因为它对整个东亚文明更具有普遍的涵盖性。也由于此，我们可以说“新儒学是东亚文明的共同体现”，但不宜说“宋明理学是东亚文明的共同体现”。

把上面所引的那段话中的“宋明”两字去掉，这一段文字应该没有问题了。但这个问题说明，中国学者往往缺少对“东亚”的清晰的、有分辨的意识。我在《宋明理学》中加入李退溪一节，其原因是我意识到，“理学”不仅是中国的思想，也是韩国的思想，亦

是日本的思想，韩国以及日本的新儒学都曾在理学思想上作出创造性的贡献，应当把这些贡献展示出来；这样才能把理学体系所有的逻辑环节和思想发展的可能性尽可能地揭示出来，也可以把理学和不同地域文化传统相结合所形成的各种特色呈现出来。但是，朝鲜时代和德川时代的朱子学与阳明学，在广义上可以称为理学，或新儒学，却不能称为宋明理学。

虽然中、日、韩等东亚国家在历史上都曾有儒学，有朱子学和阳明学，但各个国家的儒学可能有相当大的差别，各个国家儒学在该社会所居的地位也各有不同，需要做细致的比较研究。研究日本儒学和韩国儒学，而不充分了解中国儒学，就不能了解，相对于中国的儒学，日本、韩国的儒学真正的特点和发展。同样，只了解中国的儒学而不了解日韩的儒学，也难以真正认识中国儒学的特质。例如，不全面了解朱子哲学的各个方面，而只就李退溪研究李退溪，就无法了解李退溪的著作中，哪些是朱子讲过而退溪复述的，哪些是退溪对朱子思想的发展。又如，只有全面了解中国宋元明清儒学内部对朱子哲学的各种批评，才能真正了解德川时代儒学对朱子的批评中，哪些是与中国宋明儒学的批评相同而一致的，哪些是与宋明儒学的批评不同而反映了日本

思想的特色。反过来说，只研究朱子的思想，而不研究李退溪、李栗谷、伊藤仁斋的思想，就不能了解朱子哲学体系所包含的全部逻辑发展的可能性，不能了解朱子思想体系之被挑战的所有可能性，以及朱子学的多元发展的可能性。从而，这样的朱子哲学的研究就是不完整的。

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学者渐渐加强了对韩国朱子学和日本德川儒学的研究，但与日本学者、韩国学者对东亚文化的广泛研究相比，中国学者对日本和韩国历史上的儒学研究很不够，研究的成果也不多，需要大力加强。

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除了中国儒学外，我也作过一些关于韩国、日本的儒学研究。研究的起因本是中国儒学的研究有关。我在处理朱子哲学心性论的过程中，发现日本学者也关注朝鲜朝的朱子学特别是李退溪的讨论，因此，我在写作朱子哲学的博士论文期间，便写了两篇关于李退溪的论文，一篇是讨论李退溪与奇高峰的四七之辩，一篇是讨论李退溪对朱子的继承和发展。这两篇论文都发表于1985年。我在写作这两篇论文时，中文世界还没有可以参考的资料和论文。所以，在中国学者中，可以说，我是最早研究韩国儒学的

学者之一。以后，因参加国际退溪学术会议，又写过两篇退溪哲学的论文。随着中国与韩国学术交流的发展，借由参加中韩学术会议的机缘，我也写过宋时烈、李穡理学思想的论文。1995 年我到日本东京大学访问，进行林罗山的朱子学思想研究，研究的论文后来也发表了。由于我对文化与现代化的问题一直都感兴趣，所以我也写过论文，讨论中日韩三国儒学历史文化特色，并写过罗伯特·贝拉《德川宗教》的书评。而总的来说，我对东亚儒学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对韩国朱子学的研究方面，这些研究现在都收入这本书中。本书的价值，在我自己看来，这些关于韩国及日本朱子学的研究，都是在我自己对朱子研究最熟的时候进行的，应当说，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朱子学研究者对韩国和日本朱子学的研究的基本水平。

感谢友人甘阳、舒炜的建议，没有他们的建议和推动，我是不会想到把这些东亚儒学的研究讨论收集一起、编为此书的。感谢退溪学研究院、退溪学会和已故李东俊先生，感谢池田知久教授、吾妻重二教授等日本友人，正是他们的帮助使我有机会获得相关的资料，进行了这些初步的研究，扩大了对东亚儒学的认识和理解。

2008 年 2 月

目 录

前 言	1
李退溪对朱子的继承和发展	1
李退溪与奇高峰的四七理气之辩	21
李退溪心学之研究	43
李退溪性理学的再研究	67
宋尤庵与李朝中期的朱子学	94
李牧隐理学思想简论	116
林罗山的理学思想	135
中日韩三国儒学的历史文化特色	178
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东亚传统 (《德川宗教》读后)	212

李退溪对朱子的继承和发展

李滉，字景浩，号退溪，朝鲜时代著名的理学思想家，生于燕山君七年（1501，明孝宗弘治十四年），卒于宣祖三年（1570，明穆宗隆庆四年）。李滉生七月丧父，幼从叔父问学。早年曾任弘文馆修撰、成钧馆司成，明宗初任丹阳、丰基郡守，中岁卜居退溪之上，因以自号，学者都称他为退溪先生。此后虽曾受任成钧馆大司成、工曹判书、弘文馆大提学、艺文馆大提学、知中枢府事等职，但始终一意归退，以恬退名节。他晚年筑舍于陶山之麓，潜心味道，优游山水，自号陶翁。

发源于中国大陆的程朱“理学”于高丽后期已传入朝鲜半岛，李朝建国后朝鲜理学逐步发展起来。李退溪